**增长回稳超预期 动能回调成必然**

**----2017年第4季度和全年宏观经济分析**

张曙光 张弛

**增长回稳超预期 动能回调成必然**

**----2017年第4季度和全年宏观经济分析**

张曙光 张弛

内容提要：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6.9%，是2011年以来第一次回升，总体规模突破80万亿元，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30%，超出人们的普遍预期。确是一大成绩。不过，回升的基础不稳，潜在风险正在聚集。需要从落实保护企业家和财产权、真正简政减费减税，优化营商环境，以及增加创新活力和提高增长质量等方面使劲用力。世界经济景气处于下半场，中国经济周期性行业回落，经济增长动能向下调整已不可免，切不可为保增长而有悖于经济调整转型的大方向。

**一、总量态势**

**1.全年经济增速平稳**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82712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分季度看，一、二季度同比增长6.9%，三、四季度增长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65468亿元，比上年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334623亿元，增长6.1%；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32亿元，增长8.0%。

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实际增长6.6%，增速比上年加快0.6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6.5%，集体企业增长0.6%，股份制企业增长6.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6.9%。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下降1.5%，制造业增长7.2%，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8.1%。

**2.居民消费价格微涨**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1.6%，涨幅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1.7%，农村上涨1.3%。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下降0.4%，衣着上涨1.3%，居住上涨2.6%，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1.1%，交通和通信上涨1.1%，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2.4%，医疗保健上涨6.0%，其他用品和服务上涨2.4%。在食品烟酒价格中，粮食价格上涨1.5%，猪肉价格下降8.8%，鲜菜价格下降8.1%。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8%，环比上涨0.3%。

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6.3%；全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比上年上涨8.1%。

**3. 就业市场总体稳定**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300万。1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8%。

**4.汇率继续升值**

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14万亿美元。12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5342元人民币，比9月末升10.27个基点。

**二、因素与结构**

**1.投资增速回落 网上销售加快**

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下同）631684亿元，比上年增长7.2%，增速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投资232887亿元，增长10.1%；民间投资381510亿元，增长6.0%，比上年加快2.8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0.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20892亿元，增长11.8%；第二产业投资235751亿元，增长3.2%，其中制造业投资193616亿元，增长4.8%；第三产业投资375040亿元，增长9.5%。基础设施投资140005亿元，增长19.0%，比上年加快1.6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投资比上年分别增长17.0%和8.6%，分别加快2.8和4.2个百分点；高耗能制造业投资比上年下降1.8%。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6262亿元，比上年增长10.2%，增速比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60613亿元，增长8.1%。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14290亿元，增长10.0%；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1972亿元，增长11.8%。

全年全国网上零售额71751亿元，比上年增长32.2%，增速比上年加快6.0个百分点。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54806亿元，增长28.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5.0%，比上年提高2.4个百分点；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6945亿元，增长48.1%。

**2.进口增长快于出口 利用外资止跌回稳**

全年进出口总额277921亿元，比上年增长14.2%。其中，出口153318亿元，增长10.8%；进口124603亿元，增长18.7%。进出口相抵，顺差28716亿元。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16.8%，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56.4%，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2.1%，占出口总额的58.4%，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1-11月，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0185家，实际吸收外资8036.2亿元人民币（折1199.1亿美元，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同比分别增长26.5%和9.8%。

**3.一般预算收入增长快于GDP 政府性基金收支增长超常**

1-11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1748亿元，同比增长8.4%。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7390亿元，同比增长8.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4358亿元，同比增长8.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36072亿元，同比增长11.2%；非税收入25676亿元，同比下降4.5%。

1-11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9560亿元，同比增长7.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5670亿元，同比增长7.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53890亿元，同比增长7.9%。

1-11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9307亿元，同比增长30.1%。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457亿元，同比增长4.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5850亿元，同比增长32.5%，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1390亿元，同比增长35.3%。

1-11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46188亿元，同比增长31.2%。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2276亿元，同比增长24.3%；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关支出43912亿元，同比增长31.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39168亿元，同比增长33.6%。

**4.货币供应量增速趋缓 贷款增长快于存款**

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67.68万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9个和3.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5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1.8%，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9个和9.6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7.06万亿元,同比增长3.4%。全年净投放现金2342亿元。

12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125.61万亿元，同比增长12.1%。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2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2.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6个和0.8个百分点。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3.53万亿元，同比多增8782亿元。12月末，外币贷款余额8379亿美元，同比增长6.6%。

12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169.27万亿元，同比增长8.8%。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164.1万亿元，同比增长9%，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6个和2个百分点。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3.51万亿元，同比少增1.36万亿元。12月末，外币存款余额7910亿美元，同比增长11.1%。

**5.货币市场成交量下降 同业拆借利率基本稳定**

2017年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回购方式合计成交798.18万亿元，日均成交3.18万亿元，日均成交比上年下降3.2%。其中，同业拆借日均成交同比下降17.7%，现券日均成交同比下降19.1%，质押式回购日均成交同比上升3.5%。

12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91%，比上月低0.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47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3.11%，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高0.11个和0.55个百分点。

**6.A股整体振荡缓慢上扬 涨幅落后于其他股市**

2017年A股整体呈缓慢振荡上扬趋势。上证综指年初3105点开盘，年末收盘3307点，年中低点为3106点，年中高点为3450点，全年上涨6.23%。上证综指、沪深300、中小板指分别上涨6.56%，21.78%，16.73%，创业板指下跌10.67%。

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011年以来的最好水平，绝大数股市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历史新高不断被刷新。相比来看，中国股市涨幅落后。美股市场继续延续已持续8年的牛市行情，道琼斯指数由2009年的6470涨至2017年末的24850点，指数番了两番。纳斯达克指数由2009年的1265点涨至2017年末6904点，涨了近5倍。全年道琼斯指数涨幅25.26%，纳斯达克涨幅29.3%。另外，其它主要股市表现也很好，恒生指数涨幅34.44%，日经225指数涨幅19.82%。2017年，新兴市场股市表现突出，涨幅大幅领先发达国家，越南NHX30指数涨幅达50.57%。



三，政策效应

1. 宏观经济总体观察

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80万亿，达827122亿元，增长6.9%，较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改变了自2011年以来的下行态势，首次出现回升，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了30%，超过了人们的普遍预期。在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属不易，可喜可贺。前两个季度分别增长6.9%，后两个季度分别增长6.8%，平稳得几乎成一条直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思考，此属偶然巧合，还是必然的结果？从统计局长的报告发布和报刊的解读来看，当属后者，但对此并未给出全面有效的解释，基本上是一种报喜不报忧的行事方式，降低了公信力和说服力。

支持经济回稳的主要因素有，一是最终消费支出比较稳定，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0.2%，比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58.8%，高于资本形成26.7个百分点。而且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支撑。居民可支配收入25974元，名义增长9%，实际增长7.3%，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跑盈了GDP，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

二是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6%，比上年加快0.6个百分点的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对GDP的贡献为58.8%。前者的加速说明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增强，后者的加速说明结构调整的进展，二者符合经济增长的规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是在世界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外贸进出口货物总值27.79万亿元，增长14.2%，对GDP的贡献9.1个百分点，改变了此前两年连续下降的局面。

在肯定经济增长成绩的同时，也应当充分看到，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潜在风险正在聚集，周期性回调的趋势已成必然。从当前暴露出来的问题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有几个省市已经披露了过去经济数据的造假问题。最先承认经济数据有假的是辽宁，2017年初，辽宁主动承认2015年GDP虚增23%，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1066（3191-2125）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支出减少457（4617-5015）亿元，造假609（1066-457）亿元。接着是内蒙，经审计，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减530亿元，占总量的26.3%，核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最近是天津，2016年，天津滨海新区的GDP为10002亿元，挤掉水分之后为6654亿元，减少了1/3，该区的GDP占全天津GDP的60%，如果按照13%的增值税计算，仅滨海新区就使天津的税收减少了345亿元。我们不知道接着而来的还有哪些地方。如果考虑到地方债务，可能有的地方已经破产，只是我们不这样看待。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过去造假，现在说真话，目的之一是为了政绩，为了升官。当然，说真话总是件好事情。了解真相总比蒙在鼓里、盲目乐观要好。局长说地方数字不实，不影响全国的数据，此话有一定道理，全国GDP并非按照地方上报数字加总而来，而是由国家统计局独立调查计算的，但据说有调查企业把上报点放在财政部门；地方GDP增长数字一般高于全国，已公布2017年经济数据的20个省市区，只有北京、黑龙江和天津的增长率低于全国。不过，说地方造假对全国没有影响，恐怕未必，这一事件的深远影响更值得关注。局长未给出具体说明和分析，还不能令人完全信服。网络以违规违法为由删掉这样的信息，我们不知道它因何违规？违什么规？造谣，应当揭露；不实，应当纠正，不明不白的删除，只能引起更多的猜疑。

其次，新增就业1300万人的确是一个好消息，新经济带动的新就业占总就业的6.4%更让人激动。但仅以此估算和分析就业和失业问题依据不足。新经济消灭了一批旧岗位，也创造了一批新岗位。由于营商成本增加，一些外资企业撤出，不少人失业，如希捷关闭苏州工厂裁员2000人，日东电工1月份停产，2月份解除合同，正式退出中国市场，大概也有1000人失业。由于环境整治风暴，成万计中小企业关门，也有很多人需要重新就业。北京等一些城市拆除违建，驱赶低端人口，也会增加失业人数。只有扣除掉失业人数，新增就业人数才有实际意义。同样，国务院发布文件，进一步鼓励引进外资，2017年实际利用外资8775.6亿元，也是一个重要业绩。当外资大举进入时，这样计算当然没有问题，但当有外资撤离时，这样对待就值得考虑，只有进入的外资扣除撤离的外资，才是真正实际利用的外资。

再次，一般人认为，稳投资是稳增长的关键。无论从理论还是我国的实际来看，这是有道理的。2017年投资增长7.2%，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但仍高于经济增长率，说明投资的效率在下降。更重要的是增长结构和速度分布，国有控股投资增长10.1%，民间投资增长6%，虽比上年加快2.8个百分点，但只及国有控股投资的59.4%。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9%，高新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7%和8.6%，虽比上年分别加快2.8和4.2个百分点，但却明显低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国有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这可能是难以持续的。

1. 优化营商环境

最近以来，营商环境是人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受到政府高层的重视。据发改委发言人提供的数据，5年来，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44%，中央层面投资核准事项累计削减90%，中央政府定价项目缩减80%。这都是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措施。然而，“雪乡宰客”和“企业家质疑亚布力管委会”事件的发生，说明中央层面的“放管服”和简政改革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现官和现管才是能否落实的关键，我们的营商环境还存在不少问题，也许东北更甚。因而，继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和《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两个重要文件，国务院又做出具体部署。今年1月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简政减费减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改善营商环境，落实产权保护是重要的关键。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把“严格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作为三大举措之一。这就需要真正确立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无论是公有产权，还是私有产权，都要同等加以保护。问题在于，自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以后，这就成为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行动指南，事实上，计划经济建立的过程就是私人产权消灭的过程。其实这是误读。这里的“消灭”，德文原意是扬弃、保留、提高的意思。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实际上是从消灭私有产权到重新确立私有产权，尊重和扩大个人的经济自由。这也是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秘密。然而，由于传统观念作怪，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仍然发生了一系列侵犯私人产权的事件，最突出的是政府官员凭借手中权力，利用各种借口，整倒不少企业家，侵犯企业家的财产。从改革开放初期温州的“八大王”事件，到重庆的“扫黄打黑”，从顾雏军案、曾成杰案，到最近的亚布力事件。因此，从纠正这些冤假错案入手，是落实保护产权的最好突破口。好在，最近最高法院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宣布重审顾雏军案，派员赴浙江听证吴英诉东阳市政府案，细致询问吴英资产现状，就是证明。

有人说，这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性思维，是经济下行、资本外流情况下的一种应急措施，不是要确立根本性制度安排。其实，我们的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当年邓小平决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一种市场经济工具论的做法，这从邓小平南巡前后的讲话就可得到证明。但结果是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其实，评价一件事情不是看它的目的是什么，而是看他采取什么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手段是否符合人类普遍认可的规则，可见，手段可能比目的更重要。我们提出和确立的很多目标都很好，但实施手段不当，往往事与愿违，南辕北辙。因此，不管出发点如何，背后的考虑如何，这一次采取的手段是对的，因而在产权保护方面也会有所前进。只是希望能够持之以恒，形成制度，把好事做到底。

与此相关，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进行违宪审查。这是确立法治秩序，依法治国的根本大计。最近三、四十年来，我国出台的法律、法规是最多的，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是明显的。但是，由于时间较紧，准备不足，知识储备不够，特别是观念还有差距，因而，很多法律法规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中有一些并非良法，而是恶法，直接侵犯了老百姓的人权和产权。再加上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侵犯人权和产权的事情时有发生。据透露，最近几年来人们提出的违宪审查案件有数千起，最近公布受理了5起。这是一个进步的开端。应尽快建立违宪审查机构，从那些影响较大的违宪法规着手，公开听证，进行讨论，做出裁决，予以废除。这不仅能够推动营商环境的改善，而且更是我国法治的重大进步。人们对此寄厚望！

营商环境涉及的方面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税负的轻重。因为税负是政府对私人产权的删除和限制，直接构成营商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想一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靠什么吸引外资？各地都靠税收的三减两免，土地七通一平和低价优惠、低工资又没有社会保障，现在一些外资其所以撤离，内资也到国外投资，也是因为税负较重，地价上涨，劳工成本增加。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吸引外资和优化营商环境的文件，也把简政减费减税作为最重要的一条。近几年来，政府也一再推出减费减税措施，2016年营改增，据说减税6000亿元，然而据实地调查，不少企业税负未减，有的企业不减反增。2017年，政府又提出给企业减税10000亿元，但实际情况是，全年GDP增长6.9%，而1-11月政府一般预算收入增长8.4%，其中税收收入增长11.2%，分别是GDP增长率的1.22倍和1.62倍，基本上保持了近30年来的一贯态势。1-11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税收增长了4.4%，民营企业的税收增长了15.9%，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了50%左右，民营企业的利润只增长了15%左右。这也透露出平等保护产权存在的问题。所以，增税容易减税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对国企减税易，对民企减税难，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在这种情况下，最近又开征了环境保护税。不是说环保税不该征，而是说在开征新税的同时，如何去除旧税，同时实行减税。

大家知道，特朗普减税法案经过全国讨论、国会通过、总统签署实施，我们的报纸一片质疑和批评，是否也应当思考一下，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一是全国公开辩论，各种反对的意见都可以公开发表，因为税收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纳税人有权参与，这也符合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二是减税的效果已经显现，且不说福耀玻璃、三星、富士康等去美国投资，据说平果公司要把海外2000亿美元的利润汇回美国，至于对GDP的影响，虽然估计差距很大，从0.2%到7%，我们没有根据相信其中那个，取中间值总可以吧，那也是3-4个点，不小了。三是简化手续，这是人们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报税的文件数十上百页，一般人根本搞不懂，只好让律师去打理。现在简化成一张卡片纸，一目了然。这真正是替纳税人考虑。四是特朗普公开宣示，为中产阶级或者富人减税。因为创造税收和交纳税收的主要是中产阶级或者富人。这是找准了减税的主要对象。千万不要拿我们的标准（实际是意识形态）去衡量他人。五是我们总是宣染特朗普减税会引起国际税收大战，破坏国际税收秩序。事实上，日本、英国等也提出减税，有可能形成一个减税的国际浪潮。这没有什么不好，也不存在什么国际税收秩序，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规模已经很大，还在不断扩张，干了不少扭曲市场、干扰和侵害老百姓的事情，现在在美国的带头和压力下减税，让利于民，有什么不好呢？我们首先应当研究如何向人家学习，如何进一步真正减税，其次也要做些准备，因为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万一美国减税出了不可预料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

1. 推动创新发展

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如火如荼，成为全球主要大国竞逐的高地和重塑全球竞争力的共同选择。据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的《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提供的数据，现在全球GDP的22%与涵盖技能和资本的数字经济紧密相关。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GDP比例达30.3%。另据麦肯锡2017年12月4日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报告》，2016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占全球40%，中国个人消费交易额7900亿美元，是美国的11倍。全球262家独角兽（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私营初创）企业中有1/3 是中国企业，占独角兽企业总估值的43%。中国正在迎来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的各种业态、各种产品、各种服务模式的蓬勃发展，是由于中国13.9亿人口形成的巨大市场规模为业态生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特别是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59500元，折合9100美元，按照国际标准，正处在消费升级的重要阶段，需要各种更便捷、更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从供给方面看，是由于中国的市场制度还很不完善，营商环境也存在诸多不便，直接影响和约束着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创新成为突破这些瓶颈，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方面，同时，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存在着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数字技术在生产经济活动中的导入和扩展，形成数字经济生态，包括共生关键技术创新和大数据应用。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大数据应用发展很快，但是共生关键技术创新很少。这是制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比如，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市场，有人估计约为美国的90倍，且弯道超车，基本跳过了银行卡阶段，据“一带一路”沿线20国青年调查，支付宝与高铁、网购和共享单车被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2017年第3季度的市场交易规模29.5万亿元，同比大增226.2%，第4季度有可能突破35万亿元，轻现金交易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时尚，据益索普公司问卷调查，26%的中国受访者出门只带不超过100元的现金，14%的人不带现金。行业巨头也争相竞逐市场，支付宝占市场规模的53.73%，腾讯金融占39.35%，中国银联与京东合作，携手商业银行及支付机构共同发布银行业统一APP“云闪付”参与争夺。然而在共生关键技术创新方面，我们却善乏可陈。最近，由下一代互联网工程中心牵头发起的“雪人计划”，于2016年在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德国、法国等16个国家完成25台IPv6根服务器架设（取代原来的IPv4），其中1台主根和3台辅根部署在中国，打破了过去中国没有互联网根服务器的困境。也算是一个突破，但必须清醒，在这方面我国需要有更好的机制，投入更多的资源，花费更大的精力。

再如，近几年“共享经济”发展迅猛，除了滴滴出行、共享单车以外，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共享电脑、共享大厨、共享珠宝、共享衣服等也陆续加入。2016年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34520亿元，增长103%，融资规模1710亿元，增长130%，与共享经济行业相关的手机应用多达数百个。然而，共享经济是把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而不是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美国共享汽车之父Zipcar公司创始人罗宾·蔡斯把“产能过剩”看作共享经济的基础，认为“产能过剩、共享平台和人人参与”是共享经济的三大要素。共享单车由于绿色出行，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受到欢迎。然而，国人好刮风，把共享雨伞、共享篮球、共享充电宝之类本不属于共享经济范畴的东西，也当作共享经济来玩，哪有不走样之理。不仅如此，真正的共享经济也是冰火两重天，由于市场竞争激烈，ofo和摩拜单车正在布局二、三线城市和海外市场，而小兰单车已经宣布解散，其他则倒闭的倒闭，被合并和被合并。ofo和摩拜单车也因恶性竞争，以规模取胜，盲目投放，而不是服务为先，再加上管理跟不上，乘用人乱丢乱放，成为城市一大公害。因而也需要加强监管，能否探索和创造一种平台和城市共管的模式。比如，一个城市投放总有一个合理规模，过分超过合理规模必然产生问题。再如，既然提倡公交+单车的出行模式，那么就应当解决单车的路权和停放空间问题。在此之前，北京市交通部门搞的红白单车还有专门的停放设施和专人管理，公交车站上下斑高峰也有协管人员，为什么不能在共享单车的管理上也复制过去的经验。

发展数字经济，建设创新型国家，既需要依赖市场的自由运作和个人的创造才能，也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建立一套适合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治理体系。有人提出了“数字经济的中国模式”是一种政府和市场“二合一的混合模式”，在数字经济的创新和发展方面，市场主导，在数字经济的安全和治理方面政府主导。但也担心未来可能出现三大危险：一是政府会不会过度作为，打破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有效平衡；二是市场垄断会不会崛起，改变长期开放竞争的格局；三是全球化不足。此议值得重视！

数字经济迅猛高歌，业界十分热闹，数字经济实践早已走在了理论的前头，人们对数字经济理论研究却关注不够，主要是一些互联网专家参与讨论，而经济理论家们往往置身事外。比如，数字经济生产力的问题，其特征如何，结构怎样、动态变迁的规律是什么样的。再如，研究数字经济的方法和方法问题，如何运用异质性方法去代替同质性方法，如何从拥有权中心论向使用权中心论转变。再如数字经济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价值理论和价格理论、市场理论和交易理论、产权理论和合约理论、组织理论和协调理论、生产理论和共享理论、租金理论和金融理论、劳动就业和福利理论，以及国际分工和合作理论等，都有新问题需要研究。以及数字经济理论体系如何逐步建立，数字经济的概念范畴如何创新等，都是经济理论家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四，体制分析

2017年12月20日，财政部长肖捷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文章，明确提出，要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并表示，力争在2019年完成全部立法程序，2020年完成“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改革任务。文章一发表，开征房地产（持有）税一下子又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建设和交易环节的房地产税早已征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意见分歧很大。反对者不乏其人，公开表态的如已故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他留下的警世之言是，房地产税是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内部表态的如前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认为开征房地产税缺乏法理基础。主张开征房地产税的也大有人在，包括财科所前所长贾康和现所长刘尚希。现在还拿不定主意的如李炜光。从我国目前的决策机制和治理方式来看，凡政府决定要做的事情，都会全力推进，落实实施。政府决定要在2020年落实完成税改任务，那么，房地产税的出台实施也就是没有任何疑义的。既然如此，讨论一下开征房地产税的目的和作用是必要的，特别是应当以什么为目的，实际以什么为目的？可能会有什么作用，实际会起到什么作用。

从肖部长的文章和现有的讨论来看，开征房地产税的目的有三：一是完善税收制度，建设现代财政，实现税权法定，预算公开；二是确立地方主体税种，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三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建立房地产发展长效机制。三者虽然都是开征房地产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究竟以何者为主，或者说实际以什么为主，却可以大有讲究。我们按照三二一的次序分别加以讨论。

1. 关于抑制房价上涨

最初提出开征房地产税是在房价迅速上涨的年代，很明显，当时人们是把它作为约束炒房，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手段。前些年，上海和重庆的双城记试点，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就是现在，人们对此也寄于厚望。财富证券对北京开征房地税进行了模拟测算，如果人均住房40、45和50平方米免税，考虑到其对新增住房供求的影响，北京市房价下跌的范围在11-38%、10-25%和5-12%。这种模拟是有意义的，但实际情况会怎么样，恐怕是模拟不了的。从理论上来看，开征房地产税会增加房子的持有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自然会抑制需求，增加供给，导致房价下跌。模拟测算也是据此而做的。但是影响房价的因素很多，且不同的市场条件会出现不同的情况。比如，在需求大于供给的地区，开征房地产税，卖方有可能把税收负担转嫁给买方，同时在增加出租房源的同时，也可能提高房租，因此，开征房地产税能否使房价下跌，能否下跌到上述比例，恐怕还值得进一步观察。与此同时，随着房地产税的征收，其他因素会怎样变化，是抑制还是刺激房价，还说不定。讨论这样的问题，不能以其他条件不变为前提。这是沙盘推演，不是现实生活。

关于房地产业平稳发展的长效机制更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综合，其主体是住房制度本身，此外，还有住房金融制度、住房土地制度和房地产税收制度。我们的住房制度本身就相当复杂和相当混乱，城乡有别，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以及共有产权房、大产权房和小产权房也不一样，政府的“五限”（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虽然抑制了房价的过快上涨，但却直接干预和扭曲了房地产市场，而住房金融和土地制度则成为房价上涨的重要推手，不解决这些问题，仅仅靠开征房地产税能建立长效机制吗？房地产税制的设计和实施能适当吗？退一步讲，即使适当，又能解决多少问题？这是一种仅就房地产谈房地产税的思路。

1. 关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设立地方主体税种，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确是房地产税能够实现的一个目标，也是加快推进开征房地产税的现实考虑。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增长态势明显不同，地方是支出快于收入，而中央是收入大大快于支出，因而，到2016年，转移支付分别占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60%和50%以上（具体见图1）。这种安排的好处是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维护全国统一，而弊端是形成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博弈，地方财政不可能独立，不可能自我约束，自我负责，自求平衡，我们的现实就是证明。

图1，近20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



二是不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土地出让金都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相当大的部分，近几年占到40-50%，因而有了土地财政一说。2013年最多，超过了地方财政收入的60%，此后开始减少，2016年的房地产热，也只有2013年的85%（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既然地卖得差不多了，地方财政再靠卖地过日子也就有了问题。不仅如此，土地出让金虽然让地方过了几年的舒服日子，但也许是搞乱财政关系的一大原因。

|  |  |  |
| --- | --- | --- |
|  | 绝对数（亿元） | 增长率（%） |
| 2003 | 5421.3 |  |
| 2004 | 5894 | 8.72 |
| 2005 | 5505 | -6.60 |
| 2006 | 7676.9 | 39.45 |
| 2007 | 12763.5 | 66.26 |
| 2008 | 9737 | -23.71 |
| 2009 | 15910.2 | 63.40 |
| 2010 | 27000 | 69.70 |
| 2011 | 31500 | 14.60 |
| 2012 | 26900 | -14.61 |
| 2013 | 42000 | 56.13 |
| 2014 | 33400 | -20.48 |
| 2015 | 29800 | -10.78 |
| 2016 | 35600 | 19.46 |

三是前已指出，辽宁、内蒙和天津等不少地方先后披露财政数据造假，现在入不付出，发生财政危机，急待增加收入，摆脱困局。中央已经明确，谁的孩子谁来抱，中央不增加转移支付，剩下的办法就是增加新的地方税种和税收。

四是原来的税制设计中，营业税是地方的主体税种，营改增以后调增了地方增值税的分成比例，但地方作为一级独立财政，没有了独立的主体税种。

基于以上考虑，开征房地产税的目的在于解决地方财政问题。这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房子是不动产，不动产的税收是稳定的，不能流失。据财富证券的测算，如果北京市对超出免征面积的部分按照2017年第3季度房屋实际价值的1%征税，则现在有房家庭人均交税额分别为8495.4元、3460.1元和1950.4元。即使按最低标准计算，也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收入。不过，这是一种就税收谈税收的思路。虽然达到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目标，但却无法实现建立现代财政体制的目标。

1. 关于建立现代税收体制

这是18届3中全会确立的改革目标，肖部长文章的题目也画龙点睛，明白宣示。对此，我们确信不疑。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确立这样的目标，而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设立地方主体税种，前提是明确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即现行说法叫支出责任）的划分和安排。国务院已经关注了这个问题，并出台了相关文件。应当是先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即干什么事，然后按照干事的需要确定地方的财权，有什么收入，负什么支出责任。这也符合以支定收的原则。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官员要不要对本地的经济发展直接负责，其财政支出中是否要包括有关经济建设的支出？与此相应，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是否要看投资和GDP。在不少人看来，政府一手抓公共治理，一手抓生产建设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如果政府要抓生产建设，钱从哪里来？恐怕税收是不能用于生产建设的，这是公共财政最基本的原则。不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行为是扭曲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是理不顺的，也有悖于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根本目的。

其次，房地产税的收入和支出。房地产税如何征收和支用决不仅仅是具体做法问题，其背后有着重要的原则考虑。中国地方政府有多个层级，省、地（市）、县、乡镇，由哪一级征收？是哪一级的收入？现行原则是充分授权，由地方（省市自治区一级）决定。按照中国的现实，除个别财政收入充裕的地方有可能主要作为地（市）和县级收入以外，大部分地方可能主要作为省级收入，小部分由基层分享。这样房地产税收也就与其他税收没有什么区别。国外的房地产税一般由基层政府征收和支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学区税。这样安排目的明确，收支透明，便于纳税人监督。而我们的房地产税，从使用上看，没有明确的目的，因而只剩下了增加地方政府收入的考虑。不明确这一问题，所谓税权法定，预算公开，也只是走走立法程序而已。

再次，关于增税和减税。前已指出，税收是营商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征房地产税显然是在增税，虽然征收的对象是房屋持有者个人，不像增值税和所得税那样直接影响企业成本和利润。为了使房地产税立法尽快通过实施，政府考虑，在征收房地产持有环节税收的同时，适当调整和调减建设和交易环节的税收。这是一种正确的设想和考虑。但是，现有建设和交易环节的税收有10多种，复杂繁琐，自由裁量权很大，怎么调，怎么减也是个大学问。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合并简化，去掉大部分税种，使建设和交易环节的税收只有一、两项。这是替纳税人着想，是真正的简政。特别是土地出让金如何安排，这也许是最混乱、最不透明、最易滋生贪污腐败的事情，能否借助此次税改，将此规范化。

最后，开征房地产税，推进税制改革，是国之大事，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能否发动全民自由讨论，是其成败的关键一着。我们很多关系到个人利益的重要决策，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和有效的决策程序，往往是暗箱操作，少数人决定，他人不得置啄。比如，前年李炜光教授提出“死亡税率”一说，这一下惊动了财税部门的领导，又是谈话，又是组织反击，又是不准进行讨论，不准报刊发表此类意见。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庸人自扰而已。这一次应当接受经验教训，千万不要这样。特别是对是否开征房地产税分歧很大，更需要纳税人自由讨论。所谓自由讨论，就是不设禁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什么人都可以讲话，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好话、坏话、甚至骂人的话都可以讲。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将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

房地产持有税是直接税，是要每一个有房产的人掏钱的。如果搞得好，有可能倒逼和真正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如果搞砸了，就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机会。我们期盼，真正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目的，妥善解决上述问题，制定一个开征房地产税的可操作的有效方案，交纳税人自由讨论，最后由人大批准通过，一步一步不走样地实施。

五，趋势预测

目前，全球经济向好，中国的外部经济在高位运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CEEM（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的报告，2017年第4季度，中国外部经济综合CEEM-PMI为56.6，比3季度上升 1.1个百分点，是2012年以来新高，全球经济整体景气处于高位。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升高，CEEM大宗商品价格环比上涨6.2%，同比上涨7.2%。全球金融市场基本稳定，外汇、货币、债券均未出现大的波动，发达经济体的股市接连创出新高，或接近历史峰值。据此，各大国际机构都调高了对世界和中国2018和2019年的经济预测。1月22日，IMF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把2018和201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均调高0.2个百分点为3.9%和3.7%，其中，美国经济分别从2.3%和1.9%提高到2.7%和2.5%，中国分别从6.5%和6.3%提高到6.6%和6.4%。1月9日，世界银行发表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受亚洲新兴经济体和中国的拉动，2018和2019年世界经济分别增长3.1%和3%，较去年6月预测值分别上调0.2和0.1个百分点。而预测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6.4%，调高0.1个百分点。

对于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我们的预测比较谨慎。尽管世界经济处于高位，中国的外贸进出口的增长还会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态势，但中国的投资增长会继续趋缓，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还处在关键时期，经济中一系列问题还需要进行调整和解决，如，近几年货币增长过快，中国企业的杠杆率不低；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率相当高，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明显下降，有的地方已经出现危机；中国房地产泡沫也很明显，不能再把它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经济的创新还未取得突破，而突破的条件和动力都还不足，营商环境的改善也非一夕之功。正如CEEM的报告所说，2018年全球经济处于景气的下半场，美欧日接棒中国继续支撑世界经济景气高位，但中国经济周期性行业回落、全球货币政策朝着收紧的方向调整，未来经济增长动能的向下调整不可避免。同时需要密切关注全球金融市场调整的风险。其实还可加上一句话，也需要关注中国金融市场调整的风险。

据此，我们对中国2018年第1季度和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季度经济指标 | 2017年全年（实际） | 2017年第4季（实际） | 2017年4季度（预测） | 2017年全年（预测） |
| 增长（%） | 增长（%） | 增长（%） | 增长（%） |
| GDP | 6.9 | 6.8 | 6.6 | 6.5 |
| 工业增加值 | 6.6 | 6.5 | 6.3 | 6.4 |
| 固定资产投资 | 7.2 | 7.0 | 7.0 | 6.8 |
| 消费品零售额 | 10.2 | 10.1 | 10.2 | 10.3 |
| 出口 | 10.8 | 10.5 | 11.5 | 11.0 |
| 进口 | 18.7 | 16.8 | 20.0 | 18.0 |
| 消费物价 | 1.6 | 1.7 | 1.8 | 2.0 |

注：1.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余指标按现价计算；

2.固定资产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工业增加值为国有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4.2017年4季度除GDP外，其他数据因未公布，均根据实际情况估计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张　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2018－01－28，于北京